

第一章 山西少年家世

生于严父慈母的山西农家少年，用一生写就了一个将军的传奇。年幼时，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，恭恭敬敬地三磕头，苦读四书五经。其师私下说：这孩子将来可望成器。将军自幼正直勇敢，16岁时以晋军学生军排长身份毅然参加辛亥革命起义。从此，一个近代中国职业军人见证了从清末至民国的全部历史进程。

农家出身 品行端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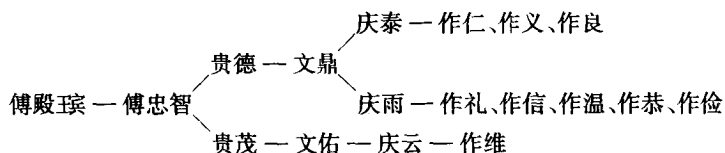
傅作信口述：

傅作义生于1895年6月27日午时，这一天正是民间传统的端午节。俗语说：“女生半夜子，男生日当午，都是个好兆祥。”一个相面的人见了这个孩子就说：“看你这个娃子属羊的，长大一定是吃粮（当兵）的。”傅的生肖正好属羊。这种说法虽近迷信，但也和后来的事实相应了，可谓巧合。

傅作义出生在山西省荣河县安昌村（现今临猗县南赵公社安昌大队）一个小康农民家庭中。傅作义的父亲名傅庆泰，母亲姓孙，继母姓张。傅作义弟兄三人，兄名作仁，字静斋；弟名作良

(继母所生)还有一个妹妹,嫁王子尚为妻。傅作义出生时,家中有滩地 20 来亩和 3 面房、9 间屋的一座庭院。

傅作义的祖上可追溯到清朝雍正年间。烈祖傅殿瑛,高祖傅忠智。据传傅忠智为人忠厚正直,粗通文墨,且能团结乡里,被乡民推为当时乡里“火花会”的会首(民间群众团体)。傅忠智生两个儿子贵德、贵茂。贵德生一子文鼎,贵茂生文佑。到这时,傅家境状况已不甚景气,文佑这一支为生活所迫,出走西口,到关外谋生。文鼎生庆泰、庆雨兄弟俩,勉强维持生计。庆泰、庆雨共生十子,按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排列。作智、作让因早夭亡,人们一般称呼为八兄弟。傅之家谱如下表:



傅作义幼时受到祖母和父亲适当的爱护和正确的教养,傅后来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,祖母和父亲功不可没。傅作义少时知书达礼,成人后更是知恩必报。傅把工作后的头一个月工资汇给家中,以表达对祖母和父亲的养育之恩。钱虽不多,其心可嘉。家人闻之,奔走相告,皆大欢喜。父亲早逝,未能奉养,傅引为终身憾事。

傅经常寄给祖母各种营养品,类如人参、鹿茸、燕窝、银耳、鱼翅等,常吃不断。深恐祖母年老怕冷,还寄来狐皮皮袄。

祖母病逝后,傅主张早日入土为安,不主张停灵在家,以防意外。出殡之前,他匍匐奔丧,一进家门,就大声痛哭不止。祭奠三日,他守灵三日三夜。与族人老农同吃一碟菜,同饮一碗汤,不嫌脏臭,族人引以为荣。有人把富亲戚列在贵宾席上,他

坚决反对，他说：“我们对穷富亲戚应一视同仁，有时还要多照顾点儿穷亲戚，使他们满意而归。”

在出殡之日，一个不到百户的小村里，竟然来了近万人吊唁。为了出殡能够顺利地进行，把这些人请进了施粥场，请他们用餐；等到灵车开出村东，则给他们发慰劳款，每人一块大洋（小孩也有份）。人们说：“吃饱了，还有钱花，”皆喜形于色。



山西省荣河县（今临猗县）安昌村傅作义出生地。1895年6月27日傅作义出生于此。

傅为祖母的丧事花了不少的钱，他认为是应该的。花钱

登报，发出讣闻，所有国民政府要员都有唁电或挽幛来悼念。张学良特奉祭席一桌，可谓隆重之至。祖母的墓志铭由榜眼夏寿田撰文并书写，可谓珠联璧合。祖母在世时，得到傅的无微不至的奉养，逝世后，又得到各方的悼念。祖母在天之灵也可安慰矣！

傅在保定军校时，有感于祖母对自己的伟大的爱，曾写出对联，以作永久纪念。其联曰：

“怕我食多，怕我食少，祖母对我无微不至；
望孙回家，望孙回校，大人待孙于此可见。”

联后有一说明：“我不会写对联，不求文字上之是否工整，只求形象地说明问题。祖母希望我回家，又希望我按时回校，以

免误期遭到禁闭；回到家里，祖母怕我食之过多，又怕我食之过少，有损健康。这种伟大的爱既是深切的，又是正确的。我愿将它书之座右 铭记在心。”

傅作义的父亲庆泰对傅的一生影响很大。他不仅把孩子养成了具有勤俭生活作风的人，也把孩子养成了具有刻苦耐劳美德的人。对傅最有影响的是他让孩子弃文从军的决定。后来傅回忆往事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要是父亲当年不让我投笔从戎，我现在能否当上一个县长？”可以想见父亲对他的前途影响之大。

伯父青年时，家里人口不多，全家生活都由他支撑。他在黄河渡口为人摆渡，水浅时背人上岸，借此微薄工资度日。后来，人丁兴旺，食之者众，生之者寡，不得不另谋出路。

经人担保借到陈家的 20 两银子，伯父只身步行到 90 里以外的禹门口，租船装煤运往西安销售。如此周而复始，积有余银，可以达到租 5 只船装 5 万斤煤的规模。不幸煤船行至潼关，遇到大漩涡，一同沉入河底。伯父及时向潼关有关商号借款，并亲自到禹门口准备借款租船，但此地已知傅家遭此大难，都不愿贷款。伯父无奈，不惜血本，雇人背银（商不厌诈，装的实际是石头）向禹门口进发，一日数人，如此数天。各商号以为傅家有的是钱，都自动地向他贷款。他用此款租船装煤运销西安，如此三趟，便使煤场转危为安。他用此障眼法已大获成功，而各商号仍蒙在鼓里。

还有一事也可说明伯父对某些事真有先见之明。那时伯父为了监督运煤，有时住在渭南，此地经常有军队过往。有一天来了一支军队，按常规军队到宿营地后，官兵总是忙于洗脸、吃饭；而这次一反常态，他们三五一堆聚在一起，都在窃窃私语。伯父看见后，情知不妙，决定把商号内的所有银钱和贵重物品及人员都迁移他处，以防不测。到了半夜，果不出伯父所料，发生了兵

变，把所有商号都洗劫一空，惟独他的商号没有丝毫损失。第二天大家疑惑不解，问及此事，伯父把所看到的情况说了一遍，大家都异口同声的夸奖伯父道：“你真料事如神呀！”傅对父亲的聪明才智佩服之至。常说：“我们则不及他的十分之一”。

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后，西太后和光绪逃到西安。各煤场都供应皇家用煤。伯父以货真价实，赢得皇家的赞许，他的煤场被规定为专供皇差，其他煤场掺假不准供应，只得以低价售给傅家，这样傅家就发了大财。有人说，他生财有道，能把黑石头（指煤炭而言）变成白银子，滚滚而来。

还有一事，对傅的前途影响也大。就是在西太后和光绪到西安后，有个皇家小官住在傅家的煤场内。他与伯父天南地北无所不谈，伯父的知识之广，见识之多，使这位皇家小官大为惊异，以为他上过什么大学堂，一再要求他随同他们回京做官，伯父以出身低微，婉言谢绝了。如果伯父随他们回京做官，不免要带着年仅五六岁的傅一同去北京，那么一来，傅的前途可能就在官场中过日子了。

傅家发了大财，已是“买得田园多广阔”，却“恨无官职被人欺”。村里的人有些就红了眼，千方百计地向傅家敲诈勒索，一个恶霸就是如此。我们的院墙与恶霸的打麦场相邻，院墙倒了，开始重打时，请恶少当场验证，新墙仍在老原样上。但等到墙打好后，他硬说墙打过了他的麦场一寸多，须推倒重打。伯父惹不起这个恶霸的无理纠缠，晚上只得送上 20 两银子，这才罢休。

还有一个外号叫“难套”（天津叫“鬼难拿”）的人，时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伯父，伯父都忍受了下来，真有唾面自干的雅量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伯父在遭受此种欺侮之后，曾经采取了许多措施，其中之

一，就是让侄、孙向村里大力士和驻军排长认做干爹，以壮声势，但收效不大。

祖母和父辈的勤俭持家，以身作则，潜移默化地对傅的幼小心灵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他的后来生活俭朴，都来源于此。

我们家一年 365 天，除在春节 3 天内和端午节、中秋节各一天内能吃上一些肉外，其余 360 天内不知肉味。甚至连 3 个制钱一盘的凉粉也不让我们吃，认为那是多余的。

伯父爱喝酒，每天炒一个鸡蛋，与祖母对饮。孩子们碰到了，还给孩子各吃上一口鸡蛋，所剩无几。为什么不多炒几个呢？因为鸡蛋要花钱现买，舍不得。

伯父教育孩子向来采用言传身教，循循善诱的方法。孩子有错误时，从来不骂不打。傅在太原求学时，乐善好施，同学在经济上有困难时，他无不解囊相助。再加上初到大城市，看见心爱之物，不免要买些，到年终已超支 20 两银子。回到家里将此事告诉了父亲，父亲并未责问一句，而是把他带到黄河滩上。此时天已严寒，河已结冰，父子二人脱掉鞋袜，卷起裤腿，踏破已结薄冰、深可及膝的近岸支流，涉水而过。父亲告知儿子，他当年背人上岸，不知经过此河多少万次；单身过河，因为河底泥泞，河流冲击，已不堪其苦；如再背负 100 多斤重物，更加不堪其苦；稍一不慎，滑倒在河中，即使不被淹死，也要遭人毒打。家里的钱就是从这里一文一文地积攒下来的。这一行动和这一番话，使傅大为感动，大受教益。

临行前，为了还债，父亲在秤 20 两银子时，以他哆哆嗦嗦的右手把银子放在天平上，又放在桌上，从桌上又放在天平上。如此反复多次，足足秤了半个小时。此时傅看在眼里，痛在心头。父亲把这 20 两银子和他所必需花费的银子交给他后，另外给他几两银子作为零花钱，而他坚决不要。经过这次言传身教，

傅已深知钱来之不易，以后在花销上，便注意精打细算，不再大手大脚了，从此开始了他的俭朴一生的生活。

12年之后，父亲病逝。傅谈及父亲的一生，受尽人间的欺压；由于一生自奉俭朴，从不乱花一文钱，没有过上一天舒适的生活。自己在外，从未奉养一朝一夕，实愧为人之子。每想到这些，不禁捶胸顿足，痛哭失声。

少年老成 志向高远

傅作信口述：

傅幼时爱好活动。与邻居两个孩子终日嬉戏玩耍。或骑竹马，或拉小车。夏天把杨树叶子编成小船，放在池中游荡，或索性在池中游泳。三个孩子在一块玩耍，傅总是带头人、赶车人或策划人。傅在大河（黄河）中游泳，而那两个孩子则裹足不前，不敢尝试。一次傅到河的深处顿感身体发冷，急忙上岸穿衣服，想暖和一下再去游，不料丈八浪头滚滚而下（上流暴雨常有此情况发生）他幸免于难。他喜形于色，大呼：“天救我也！”

傅爱骑马，不备鞍具，骑在马背上奔驰于村东的大道上。而这两个孩子只作壁上观，根本不敢接近马，焉敢骑马。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不顾危险，竟敢骑马奔跑，惹起村人议论纷纷。

每次遇到旋风，其他孩子以为鬼来了，都惊惶失措，避之惟恐不及。而傅竟闯进旋风里，乱打一阵，等到旋风过后，他说他已把鬼打走了。

一次，一群孩子在人行道上玩耍，忽然发现一匹惊马狂奔而来，大家都及时退在路边，惟有一个孩子吓得瘫在路中，傅迎向奔马大声连续吼叫，小手连续挥动，使奔马即从旁边狂奔而过。小孩得救了，人皆夸奖傅的勇敢，小孩的父母更感恩不尽。

一个老先生说的好：“当年司马光砸破水缸救出小伙伴，是机智有余；而傅这次抢救小伙伴是冒着极大的风险，可谓勇敢有余而且无私才能无畏。”

傅之以上的行动，使村里的人相信这个天不怕、地不怕的孩子长大了可能成才，也有可能成为傅家的一个败家子。连一个外乡的老木工也是这样说的：“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孩子后来竟成了一个大人物。”

傅爱好劳动。两岁时，家由旧房搬到新居，大家都转运衣物，傅也争着干活。大人就让他背着一吊钱，由旧房运到 500 米以外的新房，他一路小跑，很快地就把这项任务完成了。

长大能干活了，他就参加割麦子，割谷子，摘棉花等农活。在碾麦场上，他担任捡粪工作，碾麦开始，粪官先行，他及时赶到。此活虽脏，但从无怨言。我接了他的班后，深以为苦。那时乡间没有肥皂，手上臭味总是洗也洗不掉，终日叫苦不迭。在打麦场上，人们干干歇歇，而傅总是干个不停，受到祖母和父辈的称赞。

史新民口述：

傅作义幼年时，受父亲影响很深。庆泰老先生思想开朗，通达事理，对人礼让，恪守信用，人缘颇好。回家侍奉母亲，毕恭毕敬，外出经商必禀明母亲才做远行，所赚银钱必亲手交与母亲。在村中遇父老乡亲时，必下车礼让而后行。他这种尊老爱幼的品行，给少年的傅作义以良好影响。1901 年，傅作义入荣河白马庙私塾学习，由周敬达先生授课，接受启蒙教育。傅作义不喜欢上学，经常一出村就在路边哭。庆泰老先生从不粗暴地训斥他，总是谆谆诱导，给他讲上学的好处，引起他上学的欲望。傅作义聪明好动，喜做打仗的游戏，经常组织小伙伴两军对垒。

有一次，他和小伙伴们玩耍，不慎用砖头击中张生武同学的头部，皮破血流。这时傅作义感到自己做错了事，赶快跑到街上买了一包点心送到张家，并当面赔礼道歉，平息了这场风波，表现了勇于改错的精神。他自幼勇敢，有一天一阵旋风刮进村口，村人皆呼有鬼，纷纷躲避，傅作义不仅不躲，反而一躬身钻进风中，手舞足蹈地大喊：“打鬼啊打鬼”，一会儿旋风刮过，傅作义安然无恙，站在那里哈哈大笑，村人才信风中无鬼。由于家中富有，傅花钱极为大方。有一次无钱花了，他曾偷出家中农具上的绳索去卖。因此事村人说他是“西瓜皮上支门墩，非倒砸了上辈的好光景不可”。傅作义闻此言很震惊，憋了一肚子的气，心想：“你们说我不成器，我非争这口气不可。”从此他用心读书，成绩一直不错。这时他对古典小说，尤其是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说岳全传》、《水浒》等书产生了浓厚兴趣，并喜模仿其中人物的豪爽性格。同时，他也很关心外界的消息。当他知道了太原陆军小学堂的情况后，便立志从军。

1909年，傅作义考入山西陆军小学堂。陆军小学的校长是温寿泉，教官多系保定陆军学堂毕业生。时值清朝末年，内忧外患，灾难深重。陆小有进步人士秘密组织的山西同盟会，传播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。傅作义对这一革命思想接受很快。当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时，傅作义在太原也积极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行列。10月29日，太原起义首领姚维藩和杨彭龄及苗文华率义军冲进巡抚衙门，打死巡抚陆钟琦、协统谭振德等，占领了巡抚衙门，随即宣布太原起义成功。傅作义先是在城内和学生军一块维持秩序，后又随姚维藩起义军开赴娘子关抵御清兵。在娘子关战斗中，傅作义身先士卒，奋勇杀敌，取得了局部胜利，受到姚维藩的赞扬。之后温寿泉率敢死队南下到运城，傅作义偕薛笃弼、张履泰、韩忠等人追而从之。在敢死队攻打临

汾战役中，傅作义以参谋身份，参与了攻城部署和作战，取得了实战经验。直到清帝退位，中华民国成立，政局稍为安定时，傅作义才和同学们一同回校复课，继续学业。他在学校朝夕接近学习优异、有远大抱负的同学。其中有十二人和他互敬互慕，遂效三国的桃园结义，结为兄弟。这些同学是：李服膺、赵承绶、王靖国、李生达、李世杰、鲁英麟、王廷瑛、窦桂五、朱锡章、姚骊祥、武俊英、樊赓灿。加上傅作义共十三人，被人称为“十三太保”。这也是校长温寿泉所器重的十三位同学。

1912年8月，经陆军小学堂保送，傅作义进入北京清河镇陆军中学学习。在北京他又结识了山西同乡侯元耀（少白）、陈子嘉等人，交往甚密，情谊日深，遂结为挚友。逢假日常相偕到京领略古城风光，开阔眼界。傅作义在清河镇学习两年后，经过严格考试于1915年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深造。从此他精心钻研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，立志要做一个胸罗万卷的军事家，为国出力效劳。对于孙子兵法十三篇，他尤反复阅读，精心研究。同时对古代著名战役也颇为留意。如齐鲁长勺之战，晋楚城濮之战，齐魏马陵道之战，新汉昆阳之战，东晋秦苻淝水之战……他都仔细阅读，刻意体会。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，战况不断传来。傅作义也颇留意现代战争的打法，加强了对现代战争的研究。他的军事知识愈加丰富，军事才干得到了学校的赞赏。1918年秋季，傅作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，被分配到山西晋军工作，遂偕同学李服膺、赵承绶等人同回太原。

傅作义在学校放寒假时，曾回家探亲。庆泰老先生领他到黄河边上，一块卷起裤腿，站到冰寒刺骨的水中，让他体验生活的不易，鼓励他发愤读书，学出个样子。傅作义懂得家中对自己的期望，更加严格要求自己。他在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与父教不

无关系。

傅作义回到山西后，任晋军见习排长。他很注意和上、下级搞好关系。经常和战士一同从大营盘跑步到晋祠，进行军事训练。一年后他转为正式排长，带领四个兵士和几匹大马，耀武扬威地回到村中，欲报过去某些人家欺负他家之仇。庆泰老先生坚决制止他这种行为，对他说当官要爱护乡民，要与人为善，切记冤家易解不易结……傅作义记住父亲的教诲，从此立志要为家乡人民多做好事。

第二章 涿州中原发力

涿州之战，傅作义一举成名。蒋介石给傅作义发嘉勉电：“三晋军兴，锁钥九门，形胜之区，兵家所重。傅师长力撑大局，固守斯城。弥著勋勋，实深嘉慰”。将军时任晋军第六军总指挥，战天镇，守涿州，浴血数月。城头弟兄喋血，城下尸骨成堆，终赢得三大守城将军的盛誉。

风云际会 崭露头角

王畅桂郁口述：

1895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一年。当时清政府积弱已深，在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里，中国遭到帝国主义一次又一次的侵略。当时有识之士，激于义愤，发出“整军经武，挽救危亡”的呼吁。清廷迫于形势，为了维护统治，不得不改革旧式的军事制度，筹建新型军队。一方面派送青年出国学习军事，同时在国内各省设立军事学校。当时中国青年一变文弱萎靡的积习，走向投笔从戎的道路，弃文习武的新风气弥漫全国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傅作义也在青年时代投考山西陆军小学。三年后毕业时，约当辛



中原大战时担任津浦线方面作战的 阎系大将傅作义

亥革命，民国建立之后。1913 年他升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中学，两年后又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，1918 年毕业。先后七年的时间，学完了军事教育课程。据当时的队长苗玉田先生回忆说，傅作义学习上刻苦努力，生活上朴实无华，能够遵守纪律，团结同学，是品学兼优的学生。在军官学校两年中，无论学科如四大教程及典范令；术科如射击、马术等成绩都是优异的。苗先生举例说：“在射击考试中，每人五发子弹。傅的射击，弹不虚发，弹弹中靶，名列第一，誉冠全校。”总之，从陆军小学到军官学校，七年的军事教育，把他培养成了一个典型军人，这是他一生功业的基础。

傅作义守涿州，在军阀混战的中国近代史上，是一个著名的战役。1927 年 9、10 月开始的晋奉战争，涿州不是前线，当然更不是主要战场，但是，在涿州进行的晋奉两军守城与攻城的战事，却比双方主力部队的大规模作战还激烈得多、残酷得多。涿

州之战，当时竟至震惊了海外，引起国内外各界普遍关注。

1927年12月，南京国民政府发给在涿州守城的傅作义的“嘉勉电”说：“三晋军兴，九边声震，主帅以智勇名，将士以坚强胜。……涿州固守，经月余旬，弥见声威，立功殊伟。……”

“……涿州屏藩三晋，锁钥九门，形胜之区，兵家所重。傅师长力撑大局，固守斯城。……众志成城，自有金汤之固。敌不得逞，民有所归，弥著功勋，实深嘉慰。”

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称颂傅作义说：“傅师长神勇无比，各将士忠义绝伦，国内报章以至海外人士，无不惊服，传颂不置。弹丸涿邑，将因傅作义伟大之战功，而为战史上最著之名城矣。”

当时清末遗老、社会著名人士、81岁的樊增祥（樊山）老人写诗记述此事：

新收涿鹿七千人，百日燕南立大功。

十六年来千百战，英雄吾爱傅将军。

民国成立后，军阀连年混战，国内狼烟四起，民不聊生，年年处处“军阀重开战，洒向人间都是怨”，所谓“十六年中千百战”，确非夸张之词。在那数不清的战争中，傅作义涿州守城之战，是我国近代战争史上城市攻防战中最为突出的一例。

居于北京正南百里之遥的所谓“畿南第一州”的涿州，当时是奉军的后方，奉军（张作霖的奉系军队）原派有军队驻防。然而涿州之战，奉军却担当了攻城的角色，守城的倒是山西晋军傅作义的第四师。作为守城的晋军第四师，在师长傅作义的率领下，从太原出奇兵，越绝境，深入奉军腹地，奇袭涿州，一举而下，从而反客为主，据守涿城。他们立足未稳，即与奉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攻守战。奉军以几个师的兵力，将涿州城重重围困，

出动飞机坦克，使用重炮乃至燃烧弹和毒气弹，从空中、地面到地道，配合攻城。一时，区区涿城，危在旦夕。而晋军师长傅作义，竟在一无供给、二无援军的情况下，艰苦卓绝，以一当十，率部困守三个月，充分发挥了他超群的智谋与出众的胆略，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。

涿州之战，使傅作义“一举成名天下知”，为他此后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军事家树起了一块载入史册的“功名碑”。当然，涿州之战，晋奉两方军队的千百士兵，以及涿州的人民群众，都作了巨大的牺牲，付出了极重的代价；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对于军阀混战时期的晋奉涿州之战，傅作义的成名也是难逃此列的。

发生晋奉涿州之战的 1927 年，是我国近代史上风云多变的一年。这年的 4 月 12 日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四一二”血腥大屠杀事件。4 月 15 日，广州反动派又实行大屠杀，南方的革命力量遭到巨大损失。在北方，共产党先驱分子、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同志，4 月 28 日壮烈牺牲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绞刑架下。与此同时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于 4 月 27 日在武汉召开。5 月间，武汉国民革命政府的北伐部队在河南临颍大战中，击溃了奉军主力部队，胜利北上。这时，盘据在山西的军阀阎锡山见风使舵，改变了原来与张作霖联合的态度，声明“服从三民主义”，将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，与奉军对峙。6 月，张作霖在北京建立“安国军政府”，自任为“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”。7 月 15 日，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，国共两党的合作破裂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。8 月 1 日，朱德、周恩来等同志发动领导了“八一”南昌起义。8 月 7 日，中共在汉口召开了著名的“八七会议”。国民党方面，由于派系的尖锐矛盾，蒋介石在汪精卫和桂系（李宗仁）及沪派（以西山会议派为主）的联合威逼下，于

8月13日被迫下野，跑到日本。9月9日，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领导了著名的“秋收起义”。10月初，中共召开了著名的“古城会议”。11月，蒋介石从日本回国，实现蒋汪合作，蒋介石重新夺得了国民党的领导大权。12月11日，中共发动了广州武装起义。12月底，蒋介石在与日本勾结并取得美国的支持后，重任“北伐军”总司令，形成蒋、桂、阎、冯四派的联合，共同北攻张作霖。

傅作义 1927年9月——1928年1月所进行的涿州守城之战的整个过程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尖锐激烈、复杂多变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。

1927年下半年，经过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，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。但是，从全国总的情况看，由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，革命形势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，南方国民党新军阀刚刚崛起，正是不可一世的时期。而北方，北洋军阀的统治虽然遭到打击，并未大伤元气，奉系军阀张作霖还妄图巩固他的北京“安国军政府”。所以，此时无论是国民党的新军阀，还是北洋旧军阀，都在穷兵黩武，醉心于“武力统一”中国。毛泽东同志曾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如下的分析：

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，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，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。北京天津打下以后，这个团结立即解散，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。

山西军阀阎锡山，放弃与张作霖的联合，改而宣布晋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，并于1927年9月间誓师“北伐”。

阎锡山的目标在于京、津，于是他派四个军的主力部队，出井陘、获鹿、元氏、平山，沿京汉铁路北进；派两个军的主力部

队，出大同、天镇、阳高，沿京绥铁路东进，计划最后会师北京、天津。

傅作义的第四师，被阎锡山作为别动队，执行横断京汉、京绥两铁路间奉军之联络的任务，以配合晋军主力作战，相机进据京、津。晋军第四师司令部驻太原，所属各旅团分驻忻州、临汾、大同、原平等城镇。1927年9月20日，师长傅作义下动员令，23日，所属各部队从驻地出发。10月3日，全师至蔚县集结，计划出蔚县后，进至县东北之桃花堡，然后指向北京城南铁路沿线的良乡或涿州。

涿州居京保之间，北距北京百里，南距保定百余里，东南距天津200里，为京津保三角地带之要冲，紧扼北京之咽喉。当时张作霖坐镇北京，为确保京汉路之安全，把他的前敌指挥中枢设在保定，派他的儿子、少师张学良统驭。而在涿县，他派驻了一个师的兵力，由其嫡系十五师师长张作相镇守。

9月下旬，由阎锡山亲率的晋军四个主力军，突然东出娘子关，到达定州，其势甚猛，奉军措手不及，连失要地。10月初，驻守涿州的奉军十五师张作相部调往保南参战，由张学良的卫队旅王以哲部接防。

10月11日，奉军来接防的王以哲部在涿州火车站下车，陆续经涿州南门进城。当日，涿州商会会长朱德恒设宴，为接任涿城守事的王以哲等奉军官长洗尘接风。近午，一支队伍急急自涿州北门而入，穿过控扼涿州南北大街中心的钟鼓楼，继续南进，在接近由南门而来、沿南大街北行的刚刚入城的奉军时，这支队伍突然举枪射击，奉军士兵猝不及防，走在前面的死伤大半，后面的惊乱而散。继而城内枪声四起，在涿州商会会长家饮酒的王以哲等人，听见枪声，不知底细，仓皇而出，见城中已乱，他无法召集队伍，只得退到城东南角的天主堂，这时，城外火车站方